

從飄泊民族到建國之路—— 猶太復國主義之形成及演變

杜子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黃琬琿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當 19 世紀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歐之時，作為一支飄泊離散民族且已亡國近 2000 年之久的猶太人，亦受到這股浪潮的感染而出現思索自身民族的定位及猶太民族何去何從的問題，因而出現了猶太民族運動，即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為了維繫自身民族的永續長存，當時許多猶太有識之士紛紛提出若干解決方案，例如「飄泊民族主義派」主張猶太人應爭取作為各國境內少數民族而享有自治的地位，「領域民族主義派」則希望尋得一片可供猶太人安身立命的「民族家園」，「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則以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猶太國為其職志，其後並要求猶太民族必須重建國度於巴勒斯坦。然而受困於現實國際環境的制約，猶太人的上述種種理想在缺乏政治實力作後盾的情形下，盡遭國際社會所漠視，甚至在強權政治的考量下，猶太民族的權益橫遭犧牲，導致二戰慘遭民族浩劫的悲劇。以下本文擬由猶太民族運動的崛興歷程出發，其如何啟發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產生，而猶太復國主義又如何反在反猶主義衝擊下的蓬勃發展，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在推動之際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為題而進行分析，期能明瞭猶太復國主義及猶太問題之始末。

關鍵字：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以色列、錫安、赫爾茨

壹、前言

1897年在瑞士巴瑟爾（Basel）召開的第一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上，主席赫爾茨（Theodor Herzl, 1860-1904）針對猶太人的復國運動發表一段發人省思的宣言作為大會結語（Herzl, 1983: 539）：

我已建立了猶太國。當我今日在此明確宣示之際，將遭來舉世的訕笑。但或許5年，至多50年此一宣示終將實現。……我已逐漸喚醒同胞的建國熱情並令其感受到這是一場國民大會。

此語一出，招致而來者不僅只是訕笑而已，還引發反猶人士變本加厲的醜詆，甚至導致許多同胞嚴詞批判該宣言陷其處於不利之境。上述場景說明猶太復國主義在本質上所具之複雜性，以及其在發展歷程上所面臨的巨大困境。對於一個亡國已2千餘年並飽受「飄泊離散」（Diaspora）之苦的民族，若干猶太有識之士受到19世紀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進而思考如何彰顯自身民族的價值並具體擘劃民族未來的前景，致而啟發出猶太民族運動，即「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或音譯為錫安主義）的理想。

然而猶太民族運動在推動之際卻面臨實際困境。由於猶太人歷經2千餘年的飄泊流亡，已衍生出語言風俗殊異的猶太群體，以及猶太人尊奉的民族聖地巴勒斯坦位於大部分猶太人所居領域之外且受他人所掌控的無奈，因而加深建立猶太人對於民族未來走向形成一致化看法的困難，即令有猶太教信仰作為全體猶太人共同之依憑，然而受制於國際現實的影響，猶太民族運動者被迫不得不採行各種方案應對之，因而對於民族運動的前景——謀求一片可供安身立命的民族「家園」，作為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而成為各國境內的自治單位，抑或是追求建立一個自身民族所屬的獨立國家，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

這種因外在因素而導致猶太人對民族走向的歧見紛爭中，充分說明猶太復國主義人士因自身民族處於失根無土的狀態，缺乏一片民族聚集的核

心領域，使其訴求全然橫遭漠視。誠如赫爾茨上述所言，猶太復國主義者面臨此一艱鉅挑戰下，逐步認清唯有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自主的以色列國家，才是永保猶太民族萬世生機之道。然而缺乏政治實力的殘酷現實，即令有此深刻體認卻仍無力抗拒國際強權政治的操縱，竟只能沉痛無助地面對 600 萬同胞橫遭血腥屠戮的悲劇。此種民族血淚的代價終在戰後極度凝聚全體猶太人的建國共識，使猶太復國主義建國巴勒斯坦的目標，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的聲明中終底於成。

以下本文試圖由近代民族主義對於猶太民族意識的喚醒，並如何從中啓發猶太復國主義的想法，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在反猶主義下的蓬勃發展與其所面臨的困境為題而進行分析，行文之初，則須略微回溯猶太民族及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

貳、猶太人從迦南之民步向漂泊離散之途

猶太人為閃族（Semites）之一支，閃族語系諸部族約在紀元前 2500 年左右，分佈於西起地中海東岸，東至兩河流域，以及南抵阿拉伯半島及北非衣索比亞等地，其中包括巴比倫人（Babylonians）、亞述人（Assyrians）、希伯來人（Hebrews）及阿拉伯人等數十支分支部族，其中希伯來人即是後來通稱的猶太人。

希伯來人的最初發源於兩河流域的南端。依《舊約聖經·創世紀》的記載，約紀元前 1950 年左右，希伯來人始祖亞伯拉罕（Abraham）奉上帝耶和華之命而率領族人西遷至迦南地（Canaan）（Craig, et al., 2009: 64），其孫雅各（Jacob）因耶和華之神喻而易名為「以色列」（Israel，意為「神之勇士」）。以色列有子 12，其後分別成為 12 個部落之首，其中第四子為猶大（Judah），後漸成為 12 部落中最強大之一支。約紀元前 1600 年時，因迦南發生連年飢荒，迫使部分族人遷入埃及。直至紀元前 1250 年，先知摩西（Mose）率領族人離開埃及，展開歸根返鄉之路，並接受『十誡』（*Ten Commandments*）在內的摩西律法，秉遵耶和華之戒律，猶太教（Judaism）

成爲世上最早的「一神教」(Monotheism) (Kinder & Hilgemann, 1964: 37)。

希伯來諸部族其後在約書亞 (Joshua) 率領下，重返迦南故土。紀元前 11 世紀，掃羅 (Saul) 稱王，希伯來人初步國家組織浮現，其後其部下大衛 (David) 取而代之並統一迦南全境，隨即在一片猶太人的土地——猶地亞 (Judaea) 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希伯來王國，其時爲紀元前 1000 至 961 年之期。大衛之子所羅門 (Salomon) 即位之後，希伯來王國國勢步入鼎盛之期，在其統治下，於首都耶路撒冷的錫安山 (聖殿山) 建立了猶太一神教聖殿 (Kinder & Hilgemann, 1964: 37)。然而好景不常，所羅門王逝世之後，希伯來王國分裂爲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國及南部的猶太王國，先後於紀元前 721 年及 586 年亡於亞述帝國及加爾底亞帝國之手，耶路撒冷的聖殿橫遭摧毀，大批猶太人被放逐至巴比倫，史稱「巴比倫幽禁」(Babylonian Captivity, 587-38 B.C.) (Craig, et al., 2009: 65)。這種亡國的創傷強化猶太人以耶路撒冷錫安山爲其精神依歸，其後在猶太人群聚之處就出現猶太會堂 (Synagoge)，祈禱之餘並心生重回上帝「應許之地」——即「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 的堅定信念。

紀元前 539 年，加爾底亞帝國爲波斯帝國所滅，猶太人重返故土，紀元前 520 至 515 年間並重建聖殿於耶路撒冷錫安山，是爲猶太教的第二聖殿 (Craig, et al., 2009: 65)。數世紀後，猶太人終在紀元前 148 年重建猶太王國，歷時達 75 年之久。直到紀元前 63 年左右，羅馬人勢力擴張到東地中海地區，猶太人再次亡國，第二聖殿亦在 70 年時全遭焚毀。羅馬人且在 135 年將猶地亞更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 (Syria Palaestina)，並將大批猶太人強行遷移到羅馬，意圖根除猶太人與母土間的關聯 (Kinder & Hilgemann, 1964: 39)。

自從基督教勢力擴張之後，堅持獨特信仰的猶太人處境日艱，若干居留於故土的猶太人在 11 世紀後期開始的十字軍東征時幾乎盡遭屠殺殆盡，卻激發許多流散各地的猶太人日後持續不斷地返鄉。歷經中世紀至近代的數百年的持續移入，至 1800 年仍約有 5,000 名左右的猶太人居處於原鄉 (Krupp, 2001: 15)。當然經過兩千多年來的飄零流亡，落籍於其他國家的

猶太人，雖仍保持猶太教信仰，但未必堅持必須重返故土，而是尋求所處國家認可其少數民族地位。然隨著 19 世紀後期種族主義及反猶主義的激進化而使其願望愈發難以實現，爲了對抗日漸高漲的反猶浪潮，猶太有識之士遂致力於推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參、反猶行動的發展及反猶主義的出現

由於尊奉獨特的猶太一神教信仰及不願參與公眾事務，猶太人因而在歷史上總被視爲「邪惡的異類」而屢遭他族歧視與迫害。希臘羅馬時期，統治當局祭祀崇拜諸神，認爲眾神均同享供奉於萬神廟(Pantheon)之榮耀，然此種看法全然抵觸猶太人一神教信仰，因而遭其斥爲「偶像崇拜」，此舉導致當局採行激烈手段迫害猶太人(Abel, 1975: 41)。基督教興起後，猶太人境遇更形艱難。緣自基督教信徒認爲耶穌是因遭猶大出賣而亡，此等劣行根本不配作爲上帝的選民，據此基督教世界必須嚴厲懲罰猶太人，猶太人就因而被烙印上諸如貪得無饜、冷漠無情及吡睚必報等負面評語而廣遭迫害(Vetter, 1989: 9-11)。尤其自十字軍運動興起以來，凡十字軍武士行經之處，幾皆以猶太人之鮮血祭旗；黑死病肆虐期間，猶太人更橫遭謠言誣蔑而成爲代罪羔羊，大批亡於盲目濫殺之中。至 1492 年時，西班牙及葡萄牙甚且將不願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全部驅離。18 世紀之時，在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 強調人道主義的思維下，猶太人的經社地位稍獲改善，不過實質上，猶太人仍受到各國有意無意的刁難歧視而成爲社會邊緣人(Ben-Sasson, 1995: 107)。

至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拿破崙統治之期，猶太人在中西歐各國才終於逐步獲得解放，在法律上猶太人被賦予與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平等權利並取得公民權(Fernández-Armesto, 1994: 401)。至於東歐猶太人處境則更形惡化；俄羅斯帝國自 19 世紀上半葉以來，對猶太人採行一系列的強制同化政策，企圖從宗教信仰上徹底剷除猶太人的根源；至 19 世紀後期之時，俄境各地反猶浪潮愈演愈烈，全國各地「屠殺」(Pogroms) 猶太人及

其社區的事件如野火燎原般四處漫延，歷時長達數十年之久（Aronson, 1990: 59）。

與之同時，中西歐的猶太人處境雖較先前為佳，然處於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下，各國民族主義者強烈質疑懷抱「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猶太人是否真心效忠於其所屬國度，因此他們在輿論界持續地對猶太人採取進行極端歧視、誣蔑及醜詆的宣傳手法。此種民族主義者的宣傳號召廣受各國基督教信徒、保守人士及許多中產階級的支持，使得反猶思想與行動逐步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基礎。19世紀下半葉種族主義興起後，反猶作家更大量援引種族主義理論，從而形成反猶主義的立論基礎。

種族主義理論的發端者係法人哥畢諾（Comte Joseph Authur de Gobineau, 1816-87），他又被稱為「近代種族主義之父」。1854年出版其代表作《人類不平等論》（*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內容宣揚亞利安人（Aryans）為世上最優秀的種族，他雖認為亞利安人在先史時期與其他異族的混血不可免，但須適可而止，否則必定造成創造力的衰退，例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1848年二月革命後陷於動亂狀態的法國即為顯例。哥畢諾的種族主義論點成為當時絕佳的反猶宣傳工具，並進而成為反猶主義理論建構之所由（Davies, 1996: 734-35）。

「反猶主義」一詞在學術界的運用最早見之於德國記者兼種族學者馬爾（Wilhelm Marr, 1819-1904），其於1879年所出版的代表作《猶太人種戰勝日耳曼人種》（*Der Sieg des Judenthums über das Germanenthum*）一書中，首度運用「反猶主義」（Anti-Semitism/Antisemitismus）一詞。馬爾聲言猶太人裂解歐洲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導致各國社會內部因歧異而無法一體化，因而務須將「猶太人的解放」轉變為「從猶太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這係國家認同感建構的必要條件。同時馬爾以種族及文化特性來明確區隔猶太人及亞利安人種（日耳曼人種）間之不同。其要點主要有四：（1）亞利安人種在體能、健康及道德層面上皆優於猶太人種；（2）亞利安人種天性單純且質樸虔誠，猶太人種則滿懷淫邪且心機狡詐；（3）亞利安人種

安身立命於誠實事業之經營，猶太人種則傾力鑽營於投機、剝削及高利貸業務；(4) 亞利安人種為人類精神文明成就如哲學、宗教及自然科學的創建者，猶太人種則是此種成就的偽造者及剽竊者 (Pulzer, 2004: 108)。

威廉·馬爾的反猶主義理論建構後，授予了各國反猶人士立論的依據，使得全歐各國境內的猶太人紛紛受到程度不等的迫害。相較於德意志第二帝國境內層出不窮的迫害猶太人事件，俄國自 19 世紀末葉以來，持續爆發的「屠殺」猶太人暴行尤為駭人；此外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德雷福事件」(Dreyfus Affair) 所引爆的反猶浪潮，亦令猶太人為之震懾不已。該事件肇端法國反猶種族主義者指控一名猶太裔軍官德雷福充當德國間諜而欲圖顛覆法國而起，事件旋演變為法國嚴重的政治事件，該事件從 1894 至 1902 年纏訟近十年之久，其後雖以查無叛國之嫌而將已置身囹圄數載之久的德雷福無罪釋放，卻已使法國國際威望大損。德雷福事件清楚突顯出當時法國社會潛伏反猶思想及種族偏見之深，此種現象說明，反猶主義雖是德國人所創，卻是由法國人將之廣為傳佈 (麥可·本恩斯, 2003: 25)。

近代反猶行徑的逐步走向極端化，刺激猶太民族運動者深入思索自身作為飄泊離散民族的定位問題，致使猶太復國主義逐步走向興旺之期。

肆、猶太復國主義的形成及發展

「猶太復國主義」一詞首見之於 1882 年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比恩鮑姆 (Nathan Birnbaum, 1864-1937) 的作品，用以形容當時熱情昂揚的猶太民族運動。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初並非以政治面向而出現，早在 18 至 19 世紀之交時該主義即以文化面貌而呈現端倪，其興起背景則與 19 世紀中東歐地區的其他民族運動的發展歷程有類似之處。

捷克歷史學家何洛赫 (Miroslav Hroch) 曾針對中東歐各個民族主義的形成特點，作深入研究而得出下列成果。他認為一個民族在推動自身民族的重生可分為三階段：(1) 各民族的歷史學者、文人作家及藝術家等，致力於發掘遭統治當局壓迫或漠視的自身民族的歷史、語言及文化傳統，這

些人士並無政治意圖，純粹只是期望能夠維續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及傳統於不墜。(2) 當學者的工作內容漸為各民族的有識之士所明瞭後，這些知識份子隨即以學者研究成果而作為自身民族真實存在的證明，並以慷慨激昂的方式向廣大平民百姓宣揚自身民族的獨特價值，藉此激起所屬民族的民族情感。(3) 廣大的民眾接受其說而逐步參與自身民族運動，從而爭取自治地位，甚至最終走向完全獨立國家的境界 (Hroch, 1968: 25)。以上述觀點言之，猶太民族運動最初亦是由文化運動發其端，而其源起則應回溯至 19 世紀初歐洲思想、政治及社會的發展及猶太社會對之所作的回應。

在 19 世紀初，近代民族主義風潮逐漸波及全歐，尤以當時中東歐地區為然，係因當時該區各民族國家仍未建立，全境仍處於傳統封建的多民族大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境內分崩離析的德意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若干有識之士，尤其是德意志文人作家，對於自身民族文化長期受到忽略甚為不滿，因而關注自身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首發其端者係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赫德強調德意志民俗及語言的重要性，認為一個民族就是藉由自身語言及傳統文化所型塑而成 (Herder, 1967: 230-44)。此種觀點後就形成「德意志浪漫主義」(Deutsche Romantik) 的風潮，並在後來德人的反法解放戰爭中進一步發酵。由於拿破崙大軍佔領德境期間的橫征暴斂引發德人強烈反感，導致其奮起抗敵，從中激發出強烈民族自尊心，使德意志浪漫主義者的訴求——藉由珍惜過去自身民族的文化遺產而尋求民族的再生力量，在德境得到廣泛的回響，遂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浪潮臻於澎湃洶湧之境。德意志浪漫主義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風潮，對整個中東歐世界影響鉅大，由於統治者之故，中東歐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各民族長久以來皆處於德意志思想界的深遠影響下，致使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思潮，滲入同時期猶太作家及學者的思想內，並化為推動復興猶太歷史文化的大業之中。

啓發猶太文化復興熱潮的第二重要因子則為「猶太啓蒙運動」(Haskala)。該運動約 18 至 19 世紀之交時發端於普魯士京都柏林，其後逐步波及至廣大的猶太人社區。由於長期受到啓蒙哲士如伏爾泰所鼓吹的宗教寬容及人

道主義的薰陶，以及針對中西歐各國政府的猶太人解放行動所起的反思，猶太有識之士深感亦須修正自身宗教信仰的排外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於是就形成了猶太啓蒙運動。許多猶太人在社會地位改善同時，積極響應猶太啓蒙運動，投身所處國度各個領域的發展（Fernández-Armesto, 1994: 401）。同時在德意志境內亦出現猶太教改革派，致力調合猶太教教義與現實社會生活之間的落差（Davies, 1996: 844-45）。此外援引當代新式的教育理念而建立的猶太世俗學校教育，使得教育廣為普及至猶太人的社區之中，不僅培養出大批卓越的猶太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猶太人為保存自身文化而出現的猶太文化復興運動（Davies, 1996: 844-45）。

浪漫主義思潮所引發的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及猶太啓蒙運動促使猶太人開始珍惜自身歷史文化及民俗傳統，並賦予其極高的價值。這項猶太文化復興行動最初肇端於猶太人的語言復興熱潮，在東歐，從 18 世紀末開始，原本已成死亡語言的希伯來語（Hebrew）被深入研究，除了猶太會堂的禮拜用語之外，若干猶太學者將之廣泛運用於文學創作之中，試圖藉由猶太社區綿密的網絡關係而使之重新成為猶太人間重要的溝通工具，期盼藉此喚醒猶太民族對昔日希伯來王國盛世的緬懷。稍後的 18 至 19 世紀之交之期，東歐猶太人廣為使用的意第緒語（Yiddish）更被大力提倡，為了加強形塑猶太民族一致的歸屬感，若干學者亦試圖融合兩種語言而建構出單一語言，於是出現了以希伯來字母來拼寫意第緒文的呼聲，其奮鬥獲得一定程度的成果，時至 19 世紀中葉之時，以此種新型書寫型式的純文學作品及出版文獻在猶太世界的出版業中佔有可觀的數量（Davies, 1996: 844-45）。不過猶太世界的領導人對於希伯來語與意第緒語的使用，始終存有不同的看法，這種語言使用之爭最後甚至擴大至政治前景立場上的分歧，導致猶太民族運動者內部出現了路線之爭，這將在後續篇章中深入分析之。

隨著猶太文化復興運動逐步取得成就及全歐各地愈漸增強的反猶行徑，猶太民族運動就走向了第二階段，即自身民族情感被喚醒之期。如同前述，自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猶太人在俄帝國的處境愈見悲慘，各地迫害猶太人暴行不時上演，此舉刺激猶太人的民族情感並進而思索應對之道。

1861年源出普屬波蘭的猶太牧師卡利謝爾（Zwi Hirsch Kalischer, 1795-1874）在面對其東鄰猶太同胞的困境時，首度提出猶太人須以歐洲其他民族運動為本而推動民族運動，並從中體認出唯有重新建國於巴勒斯坦，才能擺脫繼續受迫害乃至於被屠殺之苦難（Krupp, 2001: 21）。卡利謝爾將原本侷限於文化領域的猶太民族運動正式推向政治目標的追求上，鼓舞了許多東歐猶太菁英人士在後續年代中投入民族運動的大業之中，使得猶太復國主義逐步在政治層面上邁向蓬勃激昂之期，於此不難窺見，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的最初根源係肇端於東歐，其因在於猶太人在俄羅斯境內所受之迫害最烈有以致之。

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所引發的第一項回響就是第一波猶太人「回歸移民」（Alija）浪潮。自1870年以來，由於受到卡利謝爾的感召及俄羅斯各地迫害猶太人行動的頻繁化，許多東歐的猶太人逐步遷往巴勒斯坦。當1880年代在俄帝國境內一連串「屠殺」猶太人浪潮爆發之後，為數甚夥的東歐猶太人更是興起有組織的移民巴勒斯坦的熱潮。儘管部分猶太人將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視為自身民族的最後依歸之所，然而對於飄泊離散於歐洲各地已歷兩千年之久的大部分猶太人而言，即令其在生活層面上亦受種族歧視所苦，卻不意謂著皆想要重返、甚至是建國於巴勒斯坦。實際上，直至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及其所屬國社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人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前，「重回以色列」的理想對大部分猶太人而言，僅存在於精神層面上，其用意在於藉由猶太教信仰來凝聚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並非指涉所有猶太人都有著建國於巴勒斯坦的一致政治信念之上。

然而至19世紀末，由於俄羅斯境內「屠殺」猶太人浪潮及法國德雷福事件在中西歐所引發的反猶情緒，在在激化猶太人民族主義者的焦慮，他們認為唯有建立一個猶太國，才能永保猶太人之生機，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就是赫爾茨。

赫爾茨被尊稱為猶太復國主義之父，原為一名記者，因震驚於德雷福事件中全法反猶勢力的高漲及東歐猶太同胞的橫遭屠戮，憤而於1896年發

表其代表作《猶太國：解決當前猶太人問題的一項嘗試》（*Der Judenstaat: Versuch einer modernen Lösung der Judenfrage*），文中他認為猶太人致力於融入歐洲各國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如果連當時屬於歐洲最開明自由的法國，反猶主義勢力都大行其道，則猶太人的前景將不問可知。因而他疾言，只有擁有屬於自身的國度，猶太民族才能久續長存（Herzl, 2006: 3）。至於何處為猶太人未來的立國之所？巴勒斯坦或是阿根廷皆為其屬意之所，不過基於猶太教義訓示，赫爾茨的著作明顯對於巴勒斯坦著墨較多，從中亦不難窺見出，巴勒斯坦在赫爾茨及絕大部分猶太人心中的至高神聖性及無可取代性。

《猶太國》出版後，招致若干中西歐猶太人領袖的強烈批判，認為書中主張將使猶太人淪為反猶人士的箭靶，反不利猶太人被認可為少數民族目標之達成（Shapira, 1995: 218）。然赫爾茨仍得到許多猶太有識之士的默默支持，僅數月之間，《猶太國》初版即銷售一空，至 1897 年，在赫爾茨及若干立場急進人士的積極推動下，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終於在瑞士巴瑟爾（Basel）召開，這場大部分來自東歐猶太人社區代表的會議中，成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成為猶太民族團體各派中最具嚴密組織及知名度最高的團體。赫爾茨被選為首任主席，該組織綱領開宗明義揭示：「猶太復國主義致力為猶太人民建立一個在公法保障下位於巴勒斯坦的國度」（Bein, 1980: 294）。其具體作為則是成立建國基金，籌劃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以供未來建國之所。會後赫爾茨積極拜訪當時各國政要，盼得到相關國家的協助，然而其期待完全落空。事實上直至赫爾茨於 1904 年逝世為止，僅有英國政府在 1903 年表示願提供在東非的一塊殖民地烏干達¹，作為猶太人的立國之地。但是此議引發世界猶太組織內部的激烈爭論，最後雖未導致世界猶太組織的全面分裂，卻因路線之爭而在組織內部形成了許多流派。

若由猶太民族運動的本質觀之，此種發展並不令人意外，相較於歐洲其他民族運動皆有其居處之母土，從中可作為民族主義向外傳佈的核心基

¹ 此處所指之烏干達並非今日烏干達共和國所在之處，而係位於今日的肯亞共和國。

礎，猶太民族運動則無此種條件，由於其精神聖地巴勒斯坦是位於大部分猶太人所居處的領域之外，因此猶太民族主義人士基於各自理想及可行性而擘劃民族未來可能的走向，致而出現路線流派之爭（Rubinstein, 2001: 72-73）。事實上早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創立前，整個猶太世界的菁英對自身民族運動的走向即已出現看法不一的現象，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成立後，因面臨建國於巴勒斯坦的實際困難，使得路線之爭更形擴大。

猶太民族運動的路線之爭首先肇端於語言問題，對於許多猶太學者而言，使用復活的希伯來語所代表的意涵是重拾昔日先祖榮光，此舉將有助未來猶太國家的重建（Rubinstein, 2001: 37）。然對於廣大東歐猶太社區而言，希伯來語是猶太菁英所使用的專業語言，根本無法取代大部分中下階層猶太庶民所使用之意第緒語。源自語言使用上的衝突最終亦導致對猶太民族前途看法上出現落差。相較於希伯來語使用者，即猶太菁英致力於追求猶太人國家的建立，意第緒語支持者則傾向於猶太自治地位的實現（Brenner, 2002: 19）。1897年，意第緒語支持者在俄國猶裔歷史學家杜伯諾夫（Simon Dubnow, 1860-1941）領導下成立「人民黨」（Folkspartey），以追求猶太民族成為俄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地位為其宗旨。同年亦出現另一支名為「聯邦」（Bund）的民族主義團體，其訴求與人民黨類似，亦主張猶太民族作為少數民族的地位而加入未來的俄羅斯聯邦，兩者間的區別在於聯邦者主張以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改善猶太人處境（Brenner, 2002: 19-20）。由於兩團體皆強調猶太民族的實質存在重於民族聚集地的取得，因而有時亦被統稱為「飄泊離散民族主義」（Diaspora Nationalism）派，該派影響力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迅速式微，尤其自1939年納粹德軍東侵波蘭及1941年襲擊蘇聯，大批猶太人慘遭屠殺後，該派的影响力全然消失。

其次，猶太民族團體中亦有一派極力主張必須取得一塊屬於猶太人的特定區域，以此作為猶太民族繁衍之所。1899年時出現所謂的「領土主義」（Territorialism）派，發起者係英國猶裔作家讓威爾（Israel Zangwill, 1864-1926）。讓威爾認為面臨反猶主義勢力愈形高張的威脅，取得一片可

供猶太民族落腳的土地乃迫切之舉，讓威爾並不堅持在這片土地上建立猶太人的國家，但要求一定要使之成為猶太人的「家園」(Home/Heimstätte)，至於何處適合作為猶太人的家園，讓威爾則偏好澳洲或南美洲 (Brenner, 2002: 19-20)。此派力求覓得一片得以讓猶太民族安身立命的「家園」，因而亦被稱之為「領域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 派。自 19 世紀末，在俄國境內出現的數波「屠殺」猶太人浪潮，以及蘇聯政權在二戰前在東歐迫害及納粹德軍在二戰期間在全歐屠殺猶太人之後，該派失去實質影響力。

約與上述兩類猶太民族主義團體同時成立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政治訴求則以猶太民族重回巴勒斯坦並建立一個獨立猶太國為目標。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與「飄泊離散民族主義」及「領域民族主義」兩流派的長期競爭中，隨著猶太民族在全歐，尤其在東歐遭受迫害的加劇而逐步取得猶太民族運動的主導地位。雖然在未來建國的立場一致，但對於如何強化猶太人建國信念上的作法卻出現看法不一的情形，這種路線之爭自 1897 年該組織創建以來即已顯現無遺，最後則導致組織內部自 1901 年後，陸續分衍出 3 支不同的派別：

一、文化的猶太復國主義

該團體成立於 1901 年，係由哈岸 (Ahad Ha'am, 1856-1927) 為主的一群年輕學者所組成，其成立宗旨在於致力復興希伯來語文為主體的猶太文化；該派強調，今日猶太人在全歐之所以屢受迫害屠殺，其因並非僅是種族歧視，而是猶太文化並未走向現代化，據此猶太人應致力於減少宗教教儀對進步信念的阻礙，進而促使猶太文化與近世文明接軌。

二、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

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創建之後，許多出身東歐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對於猶太民族運動抱持著反對態度，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落後的意識形態，應揚棄之並全力推動世界革命，進而達到全體人類社會的解放。然而後來該陣營的許多成員漸不滿於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猶太民族運動的立場及

其對建國於巴勒斯坦事務的忽略，因而在 1920 年時，左派的馬克思主義陣營另行分裂出若干立場較溫和，且致力於參與推動猶太人建國於巴勒斯坦的社會主義派系，這些秉持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士及派別與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密切合作，因而就被稱作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者認為猶太社會現今所面臨的迫切要務首在於，如何解決東歐猶太人社區因長期封閉而產生的生活水準低下的問題。他們認為猶太人的建國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同時進行，首先須將以小商及手工業者為主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工農的社會結構，並透過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而在當地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猶太國。日後秉遵社會主義理論而在以色列所創建的「集體移民」（Kibbuz）運動，對以色列的社會主義運動影響深遠。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陣營是由數支小團體薈集而成，其中較知名者為「青年勞動者」（Hapoel Hatzair）。這類包括數個小支派而合稱的左派團體在數十年後取得了世界猶太組織的要角地位，日後並成為以色列建國的主導力量（Brenner, 2002: 79）。

三、修正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

此派可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急進派，其領導人為亞波亭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1880-1940），他秉持民族主義、中產階級及反社會主義的立場，認為要解決建國問題必須起身力行，因而一戰期間在其積極號召下而在英國部隊中成立一支猶太軍團，希望藉由猶太人對協約國的實質貢獻而具體影響到英政府對猶太人建國於巴勒斯坦的觀點，他甚至認為為了促進猶太國的迅速建立，可在建國願望達成後成為大不列顛國協之一員（Rubinstein, 2001: 114-15）。

猶太民族運動除了上述所提的三大主要派別之外，另外尚有兩類擁有深遠影響力但卻不屬於民族運動範疇的猶太人團體存在，分別是被歸類為極右的尊奉正統猶太教訓諭的基本教義派，以及立場極左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大團體皆強力反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所全力推動的猶太人建國的目標。正統猶太教信徒雖然在每日三次的猶太教膜拜儀式中一再祈禱

「救世主」(Messiah)的來臨，幫助猶太人排除外在一切困難而重返以色列或錫安聖地，與此同時，他們卻極力反對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者積極地以人為之力而推動大批猶太人移向巴勒斯坦，並進而建立猶太國於巴勒斯坦的行動，因為正統的猶太教信徒認定，「救世主」的來臨及猶太人的終返以色列都必須是出自於上帝的意旨，而非是由這類偏離猶太正統信仰與傳統的所謂已然「解放」並採納西歐思潮的猶太人士所促成，因為若無上帝的神喻而強行推動建國於巴勒斯坦的目標，無異是違逆上帝的意旨。當然隨著全歐各地，尤其是東歐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情形愈形激烈的狀況下，使得這種極端奉行古老教義的正統猶太教的團體內部亦出現若干不同聲音。1902年，以萊納斯(Isaak Jacob Reines, 1839-1915)為主的部分猶太教牧師群，另行成立一支名為「東進」(Misrachi)的團體，萊納斯認為積極投入建立猶太國與「救世主」的來臨及對猶太教義及傳統堅定不移的奉行，皆可以並行不悖，因而無法接受正統猶太教徒的民族前途完全倚賴天啓的想法(Brenner, 2002: 77-78)。

立場極左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反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推動建國的目標，1901年源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者玻洛秀夫(Ber Borochov, 1881-1917)等，對於此種猶太民族運動抱持反對態度，他們在1901年成立了「猶太聯合勞動者聯盟」(Allgemeiner Jüdische Arbeiterbund)，成為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各個小團體的共同對話平台，至1905年則更進一步創立「猶太勞動者」(Poalei Zion)組織，全力推行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他們主張必須發動世界革命，認為當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所全力推動的猶太民族重建國度於巴勒斯坦運動實為一種落伍的意識形態，就他們的想法而言，只要成功進行世界革命，打倒倚賴資本主義對人民進行剝削箝制的統治階級之後，全體人類都能獲得解放，猶太人的民族問題自然而然就會迎刃而解。然而由民族主義浪潮的泛濫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各國勞工紛紛基於民族情感而投入自身國家的行伍之中為國效命，證明民族主義的凝聚力仍遠大於共產國際主義的號召，因而導致部分成員在1920年時拋棄馬克思主義觀點，轉而改採較溫和的社會主義立場，其情形一如前述般，他們致力於巴

勒斯坦建國事務的推展，以社會主義的模式來推動巴勒斯坦猶太家園的建設。基於社會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設有成的影響，原本死守僵硬馬克思教條的「猶太勞動者」組織的立場亦開始軟化，不再堅持反對猶太人建國於巴勒斯坦的想法，甚至在後來出任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理本格里昂（David Ben-Gurion, 1886-1973）的率領下，在巴勒斯坦亦建立起猶太勞動者組織，開始投入巴勒斯坦的建設事宜，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對於推動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基礎建設上，具有極大的貢獻，並且在後來以色列的政壇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雖有路線上的爭議，然而猶太復國主義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下，其對猶太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 1905 年俄帝國境內因日俄戰爭的失利及革命行動的失敗，再次引發大規模屠殺猶太人行徑，致而產生第二波猶太人「回歸移民」浪潮，總計在 1904 年至 1914 年間計有超過 4 萬人以上的東歐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這批移入者幾乎都是深受社會主義影響的東歐猶太人，他們將社會主義學者所提出的各項擘劃具體落實於建設巴勒斯坦的大業之中，因而從這段時期開始，巴勒斯坦的基礎建設與日更新，並使得社會主義路線自此後得到長足的發展，進而在日後的以色列的建國事務上取得主導性的地位（Brenner, 2002: 79）。

一戰期間，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積極爭取的國際奧援略有所獲。1916 年英軍佔領巴勒斯坦後，為爭取猶太裔的經濟支持，以及防止境內猶太人數眾多的俄帝國向德奧同盟國投降等策略考量下，決心加強對猶太人的具體支持。1917 年 11 月英外長貝爾福（Arthur Balfour）在一封致予該國猶太領袖的信件中，揭示『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公開聲明：「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並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必須明確說明的是，不得傷害已存在於巴勒斯坦的其他非猶太民族的公民與宗教權利，……」。

表面上，該聲明雖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其家園，但其行文遣詞明顯相互矛盾，試問如何能在阿拉伯人佔絕對多數且民族主義已興起的巴

勒斯坦上，建立猶太人「民族家園」而又不傷害到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英政府在此似暗藏伏筆，俾對未來可能的變局預先安排一套面面俱到的說辭。然對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該聲明大幅鼓舞他們的士氣，認為其所追求建立猶太國的目標已然在望（Brenner, 2002: 88-89）。

伍、猶太復國主義目標的實現

一戰結束之後，貝爾福宣言成為 1920 年國際聯盟將巴勒斯坦委由英國托管的依據。猶太復國主義者由此認定該宣言是猶太建國的憑證，因此一戰結束後的 1919 至 1923 年間，就出現第 3 波猶太人「回歸移民」浪潮。然而日漸增加的猶太移民數量卻也引發原居該地的阿拉伯人的反感，尤其自一戰期間的阿拉伯民族意識被喚醒以來，阿拉伯人頗不滿於巴勒斯坦淪為英國的托管地，連帶地更對持續移入的猶太人抱持著反感的態度。就阿拉伯人的立場而言，猶太復國主義者以重回「以色列之地」為號召而大舉遷入並企圖建國於巴勒斯坦的行動，無異是對當地阿拉伯人生存領域權的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認為巴勒斯坦是其先祖之地，數世紀乃至於十數世紀以來他們皆生活於斯土，當然無法容忍數量愈漸增多的猶太人移入並定居於其世居之地，甚至視猶太人持續移入巴勒斯坦，是完全攸關到阿拉伯人的生死存亡的問題（Porath, 1974: 68）。

至於猶太人以其祖先在 2000 年曾立國以此而宣稱其有擁有重回及重建國度於巴勒斯坦的歷史權利，阿拉伯民族主義則認為此種訴求無法成立，因為即使在上古時期有猶太人曾立國巴勒斯坦的史實，然而經過歷史的不斷演變，巴勒斯坦作為阿拉伯人遊牧地區及其原鄉所在，是早已歷經 2000 多年且是存續至今的事實，如果猶太人以歷史權利而要求重返甚至是重建國度於巴勒斯坦，則置阿拉伯人從未中斷的生存領域權於何在？基於此種想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持續不斷移入猶太人的不滿之情逐漸升高，致而不斷上演兩族磨擦事件。為解決潛在的民族衝突危機，英國政府在 1923 年曾將巴勒斯坦分割為兩部分，然因族群混居之故，該措施形同具文。與此同時，絡繹不絕移入的猶太移民，使得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間的緊張關係

愈見緊繃，終於在 1929 年爆發嚴重的族群衝突事件。

由於 1927 至 1929 年間因中東歐新興國家政局不穩而引發嚴重的反猶浪潮，因而導致第 4 波的猶太人「回歸移民」巴勒斯坦行動。此舉終而引爆阿拉伯人長期累積的不滿情緒。1929 年 8 月下旬，緣自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信徒對彼此教義認知不同，導致在耶路撒冷的哭牆發生激烈衝突，其後衝突迅速蔓延至巴勒斯坦各大城，最後演變成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間的族群大衝突，事件中雙方共計付出死亡近 300 人，受傷近千人的慘痛代價。「1929 年 8 月事件」標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關係的轉捩點，意即先前雙方在英政府主導下，試圖以和平方式謀求兩民族和諧共處乃至於建立共同家園的努力徹底失敗，自此之後，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敵對衝突成爲常態（Rubinstein, 2001: 96）。

與此同時，國際政局的變化更對巴勒斯坦投下一顆震撼彈。由於希特勒在 1933 年取得德國政權，大批德籍猶太人在面臨生存威脅下大舉出亡，導致 1933 至 1936 年的第 5 波猶太人「回歸移民」大浪潮，總計 4 年之中，有近 20 萬左右的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使得猶太人口總數在 1936 年時達到近 40 萬之譜。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緒因而臻至臨界點，最後引發從 1936 年至 1939 年持續達 3 年之久的全境暴動浪潮，這場「1936-1939 事件」，其暴力血腥程度遠超過「1929 年 8 月事件」。阿拉伯人在伊斯蘭宗教領袖的號召下，不僅全面罷工抗稅，甚至發動一連串的血腥衝突，試圖以激烈且癱瘓全境的方式向英政府持續施壓，要求全面禁止猶太移民入境、取消希伯來語作爲巴勒斯坦三種官方語言之一的地位，以及立即宣佈成立巴勒斯坦阿拉伯國等訴求（Brenner, 2002: 106）。不惟如此，當時國際政局的發展對於阿拉伯人的訴求亦相當有利，由於巴勒斯坦鄰近地區在 1920 到 1930 年代先後成立外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及伊拉克等國，使得阿拉伯人大受鼓舞，渴望獲致與其同族兄弟相同的政治成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目標同時得到來自德義軸心國的大力支持。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首先宣稱基於其擁有利比亞及衣索比亞的領地而企圖在東地中海地區建立其影響力，於此同時希特勒則積極與阿拉伯各重要宗教領袖建立聯繫管道，

鼓動泛阿拉伯民族運動，並確保其未來與大德意志帝國結盟，俾打擊共同敵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Brenner, 2002: 107）。

面對軸心國家與阿拉伯世界可能合流的迫切危機下，英國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因而作出 180 度的大轉變。英政府認定，一旦戰爭爆發，為避免阿拉伯人與軸心國聯手抗英，英國政府必須穩住阿拉伯人在己方陣營的地位，因而有必要儘可能滿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訴求，至於在猶太人的感受問題方面，英政府則認為其毫無選擇地只能支持英國對抗納粹德國，因而決定以犧牲猶太人的利益而換取更實質的收獲。在此種思維的主導之下，英國政府開始大幅緊縮猶太人的移入數量。1938 年底，國社黨人在德國開始大舉逮捕猶太人，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送往集中營拘禁，納粹對外宣稱這些猶太人仍有被釋放的可能，前題要件是必須有其他國家或地區准其入境。面對當時其他國家幾乎都已不再接納收容猶太人的情形下，英政府所屬的巴勒斯坦成為猶太人免遭噩運的最後希望之所，然而更弦易張的英國巴勒斯坦政策卻徹底摧毀了猶太民族的最後一絲希望。1939 年 2 月，在英京倫敦聖詹姆士王宮的兩場圓桌會談上，英政府分別對阿拉伯及猶太代表公佈其新制定的巴勒斯坦政策『白皮書』；英政府在該文件中，以取巧的方式對貝爾福宣言導向於有利於阿拉伯人的詮釋，英政府宣稱，英國政府基於貝爾福宣言而協助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的立場，是以不傷害其他非猶太民族的公民與宗教權利為前題，然而大量移入的猶太移民已傷害到該地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因此英政府決定至 1939 年起以後的 5 年內，一共最多只再收容 75,000 名猶太移民，自 1944 年起若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同意，就完全禁止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Krupp, 2001: 98』。

『1939 白皮書』（*White Paper of 1939*）的公佈，無異是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畢身所追求的建國於巴勒斯坦目標的一大打擊，同時更是對全歐納粹佔領區的猶太人的死刑宣判。猶太復國主義者深感遭到英國政府的出賣，卻無任何政治實力以資抗衡。1944 年納粹德國敗象已現，然而全歐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卻如火如荼地進行到最高峰，猶太復國主義者竟只能眼睜睜卻無能為力地看著數以百萬計的同胞在戰爭最後兩年慘遭納粹無情地

屠戮，本格里昂當時就曾痛澈心脾地發抒其感受：「數千年來猶太人在禱告之際始終問道，『何時吾民族才能再次擁有自身國家？』然無人會想到提出另一令人極感毛骨悚然的問題：『當這個國家出現時，吾民族還存在嗎？』」（Brenner, 2002: 111）。『1939 白皮書』標記著猶太民族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同使也讓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廣大的猶太民族徹底了解，唯有建立屬於自身的國家，才能走出任人宰割的命運。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確立，只要戰爭一結束，猶太民族會用盡一切手段爭取在巴勒斯坦建國並對抗英國人統治。

二戰結束後，猶太復國主義者及民族運動者旋即組織地下反抗武力，採取恐怖手段對抗阿拉伯人及英軍，並協助劫後餘生的猶太人「非法」入境巴勒斯坦（Bein, 1980: 404）。英國政府在同時面對來自阿拉伯人的政治訴求及猶太人的武裝對抗壓力下，心焦力瘁，終於在 1947 年時正式向聯合國提出終止托管巴勒斯坦的要求，聯合國為此成立一個「巴勒斯坦專門委員會」，研議巴勒斯坦的前途安排。在 1947 年 11 月底的聯合國大會針對「巴勒斯坦決議」上，以 33 票贊成，13 票反對及 10 票棄權，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分建為猶太國及阿拉伯國，至於耶路撒冷則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聯合國的巴勒斯坦瓜分決議，為本格里昂所接受，卻遭到阿拉伯聯盟的強烈反對，旋而引發兩個民族之間的激烈衝突，為次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又稱第一次中東戰爭）揭開序幕。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政府正式結束托管巴勒斯坦的身份，同時該日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廣大猶太人而言，意謂著熱淚滿盈及心弦激盪時刻的到來，這個令許多猶太人期待超過 2 千年、其間歷經鉅大民族浩劫後而終於到來的一刻。

雖有建國之初的阿拉伯諸國的聯手圍攻，然而猶太人決心保有自身國度的堅定意志已然凝聚成驚人力量，先後在數次大戰中，以寡擊眾，連續擊潰環伺週遭且武力人數數倍於己的強敵，維繫獨立國家於不墜，將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赫爾茨的信念——只有擁有屬於自身的國度，方能永保猶太民族的尊嚴，猶太民族才能久續長存——的殷切囑咐牢記刻劃心口，永鑄於猶太民族性之中。

陸、結論

歷經 2000 餘年的飄泊離散，猶太人在其教義的影響下，從未曾忘卻重回「以色列之地」的神喻，甚至在強大宗教凝聚力中化爲堅定的信念而亙古長存。即使猶太人在歷史上屢遭他族迫害，然憑藉此種精神力量仍能凝聚其獨特的猶太民族性於不墜。時及近世，儘管對落籍於歐洲各地的猶太族群而言，重回「上帝應許之地」的信念，在精神層面上作爲維繫猶太民族實質存在的意義，遠高於實際層面上的行動。然隨著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及逐漸激進化的反猶勢力威脅，猶太有識之士意識到維護自身民族存在的迫切性，而其應對之道則須喚醒廣大猶太人民關注民族定位問題，此種背景下，猶太民族運動，即猶太復國主義因而興起。

不過在實際推動時，猶太復國主義卻面臨許多困難，面對語言使用及社會條件差異極大的廣大猶太人世界，如何弭平其間的巨大落差而對猶太民族前景能夠獲取較爲一致的看法，誠爲一大難。其中尤爲艱困的是，猶太民族的聖地與聖城——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係位於廣大猶太人所處國度之外的小亞細亞，因而散居歐洲各地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推動猶太民族運動之餘，其對廣大猶太世界的任何政治號召，總因受制於現實國際政治的因素而令人心生其政策是否具體可行之問號。

吾人尤可從猶太復國主義分衍出的各種流派中，窺見猶太復國主義人士爲維繫自身民族的久續長存，可謂嘔心瀝血，竭盡所能。但在寄人籬下的狀態下，任何訴求皆不敵現實國際政治的打擊，因此期望能獲得各國少數民族地位的「飄泊離散民族主義」派，其願望終在俄帝國境內大肆屠殺猶太人的惡行中幻滅；希望能在新大陸尋得一塊土地作爲自身民族家園的「領域民族主義」派，亦屢受他國所拒而使其事無望；終使猶太復國主義者認清，建立猶太國才是真正唯一解決之道。雖然「建國於巴勒斯坦」派——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最後取得猶太民族運動的主導地位，卻無力影響國際強權對巴勒斯坦的安排，猶太復國主義者所能爲者，唯有強權政策稍或寬鬆之際，盡力協助同胞重返先祖之地，厚植日後實力。卻終究無力抗拒長期被猶太人視爲猶太民族保護者——英國政府，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將猶太人權益作為政治籌碼並隨意犧牲之，致而發生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慘遭屠戮的悲劇，令猶太復國主義者痛徹心扉，卻亦見證著二戰結束前的猶太復國主義難以成事的致命傷——毫無政治實力為後盾的任何政治訴求，終究最後只會淪為他人隨取隨棄的物件。

在此不能不提到的一點是，在這齣猶太民族浩劫的悲劇的背後，作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團體——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其政治作為亦不免遭致失策之議，因為自始至終，該組織的領導階層與英政府的重要閣員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私人情誼，他們因而憑藉著此種密切關係，自掣英國政府無論如何絕不可能出賣廣大猶太民族的利益，因而未曾、或至少並未傾其全力建立其他可提供具體協助猶太民族的政治管道，這種將猶太民族的所有希望全然置於英國政府的善意的作法，在英國政府基於自身利益而全盤更動其近東政策之後，使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頓陷萬丈深淵，終究只能眼睜無助地目睹 600 萬同胞慘遭納粹黨人的血腥屠戮。

在付出此種慘痛的民族血淚代價後，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廣大猶太民族終而強烈了解到，唯有雄厚的實力，方能達成建國的目標，亦是猶太民族永續久存的唯一保障。是以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猶太復國主義者透過各種途徑，大舉強化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區的有形物質力量，配合著廣大猶太民族強烈建國渴望的無形精神力量，方能使其重建國度於「以色列之地」之夢終底於成。

最後，對建國已成的猶太人而言，昔日竭其心力所推動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並不因此而消失，然其政治目標則作了修正，意即建國大業雖成，然如何持續維繫以色列國家的永續長存，為廣大猶太民族切身關注的焦點。因而猶太人自建國以來，以強硬的對外政策，配合著堅強的武力作後盾，將以色列的國家版圖作了相當程度的擴張，可想得見的，此舉必然有利於以色列整體國防的建構，然而於此相對的，卻造成總數數十萬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離失所的慘況。

若以猶太人在歷史上曾歷經無數迫害屠殺而淪為飄零離散民族的苦難而言，而今在其成功立國於巴勒斯坦後，卻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淪入其先

前相同悲劇的情境，這對居於巴勒斯坦亦已逾 2000 年之久的阿拉伯人情何以堪。猶太人以其祖先立國之所的歷史權利而要求重建國度於巴勒斯坦，然則對於當地阿拉伯人而言，則其歷史權利應如何伸張？這種雙方皆以歷史權利而強調領土所有權的衝突，係屬今日涉及於全球的民族爭端之中最為糾結難解的核心問題。事實上以巴問題發展至今，完全呈現著無解的僵局，尤其再加上宗教仇恨及複雜的國際因素交織混雜，徒然凸顯該問題所具有的棘手難解及爆炸性本質。對於當事者之一的猶太民族而言，昔日猶太復國主義的建國於巴勒斯坦的目標已成，然而其後如何在以色列國家的持續維繫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建國目標間取得平衡，在在考驗著以色列政府當局的智慧，然以過去數十年的發展觀之，短期內以巴問題要獲致一個圓滿的解決，恐令人難以產生任何樂觀的期待。

參考文獻

- 麥可·本恩斯(Michael Burns)(鄭約宜譯), 2003。《法國與德雷福事件》(*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台北: 麥田。
- Abel, Ernst L. 1975. *The Roots of Anti-Semitism*.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Aronson, Michael. 1990. *Troubled Waters: The Origins of the Anti-Jewish Pogroms in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http://www.mfa.gov.il/MFA/Peace+Process/Guide+to+the+Peace+Process/The+Balfour+Declaration.htm>) (2012-02-20).
- Bein, Alex. 1980. *Die Judenfrage. Biographie eines Weltproblems*, Band 1 und 2.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 Ben-Sasson, Haim Hillel, Hrsg. 1995. *Die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Beck.
- Brenner, Michael. 2002.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München: Beck.
- Craig, Albert M., William A. Graham, Donald Kagan, Steven Ozment, and Frank M. Turner. 2009. *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 Davies, Norman. 1996.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ed. 1994. *The Times Guide to the Peoples of Europe*. London: Times Books.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967.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Wiesbaden: R. Löwit GmbH.
- Herzl, Theodor. 1983. *Briefe und Tagebücher*, Band 2: Zionistisches Tagebuch 1895-1899. Berlin: Propyläen-Verlag.
- Herzl, Theodor. 2006. *Der Judenstaat: Versuch einer modernen Lösung der Judenfrage*. Zürich: Manesse Verlag.
- Hroch, Miroslav. 1968.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 Charles University Press.
- Kinder, Herrmann, and Werner Hilgemann. 1964. *dtv-Atlas zur Weltgeschichte*, Band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Fränkischen Revolutio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Krupp, Michael. 2001. *Die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Taschenbuch 1212.

- Porath, Yehoshua. 1974. *The Emergency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 Pulzer, Peter. 2004. *Die Entstehung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1867-191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Verlag.
- Rubinstein, Amnon. 2001. *Geschichte des Zionismus: Von Theodor Herzl bis Heute*. München: dtv Verlag.
- Shapira, Anita. 1995. "Anti-Semitism and Zionism." *Modern Judaism*, Vol. 15, No. 3, pp. 215-32.
- Vetter, Dieter. 1989. "Hebräische bibel-Antisemitischer Mißbrauch," in Günter Brakelmann, Martin Rosowski, Hrsg. *Antisemitismus*. pp. 9-2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Verlag.

From a Diaspora Nation to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Zionism and Its Evolution

Tzu-Hsin T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Wan-Chun Hu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When the 19th century the modern waves of nationalism swept across the entire Europe, as a Diaspora nation and had been subjugated nearly 2,000 years, the Jews also affected by this wave and began to think their own position and the Jewish nation problem of where to go. So they had a Jewish national movement that called "Zionism."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own national sustainability forever, many Jewish people of insight have made a number of solutions at that time. Diaspora Nationalism advocates that the Jews as a minority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 should strive for and enjoy autonomous status. Territorialism wants to find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s to settle down. The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ants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Jewish State, and hoped to rebuild the kingdom in Palestine. However, trapped in the reality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Jews' above-mentioned ideas, lacking the back of political power, were ign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 in such real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Jewish people to be sacrificed led to the tragic catastrophe of Jews in World War II. Therefore, the authors proposed to start from the Jewish national movement-determination process, how they inspire the production of the Zionist ideal, and how the Zionism flourishes under the impact of anti-Semitism. This article performs an analysis on Zionism and the multiple plights it faced on the occasion of promoting, giving a clear view to understand Zionism and the Jewish problem of the whole history.

Keywords: Zionism, Jews, Israel, Zion, Theodor Herzl